

Annual Review of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1)

李安山 主编 潘华琼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nual Review of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1)

李安山 主编 潘华琼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1/李安山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ISBN 978-7-301-20121-3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非洲-研究-2011-文集 IV. ①D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257号

书 名: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1)

著作责任者: 李安山 主编 潘华琼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徐少燕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121-3/D·30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9.5印张 352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非洲(代序)

李安山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

20 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21 世纪将是中国与非洲同发展的世纪。如果说,20 世纪中国与非洲共命运主要表现在列强的瓜分、社会的剧变、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建设四个方面的话,21 世纪的中国与非洲可在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塑造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通力合作。只有这样,中国与非洲才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学家:傲慢与偏见

历史学家一般被认为是智者。司马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也说过:历史使人聪慧。果真如此吗?谈到非洲,不同的历史学家说不同的话。

古罗马历史学家、《博特志》的作者老普林尼(Pleny, the Elder, 公元 23—79 年)说过一句名言:“非洲总是不断有新鲜事物产生。”

传统的历史学注重文字撰述,但非洲人有自己的理解。现代非洲学者蒂埃诺·博卡尔(Tierno Bokar Salif)指出:“撰述是一回事,知识是另一回事。撰述是知识的真实记载,但并非知识自身。知识是人类的一盏明灯,是我们祖先在认识方面的全部遗产,正如波巴布树潜伏在种子里一样,在萌芽之时,我们祖辈就把它传给了我们。”^①这里说的“知识”应该包括历史知识。当代非洲历史学家基一泽博(Ki-Zerbo)认为:“在非洲,这种创造活动,几百万年前就已开始的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仍在进行着。”^②

① 基一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1984 年版,第 121 页。

② 同上书,第 554 页。



历史学家是否也会犯错误呢?当然。由于他们掌握着记录过去和解释过去的话语权,他们对历史的误读或荒谬解释往往更为有害,从而影响人们对自身历史和他人历史的理解。

“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①这是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罗珀(Hugh Trevor-Roper)1963年11月在一次广播讲座中的说法。我们现在可以坦言:他的话是无知加偏见。

然而,这种无知与偏见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黑格尔是著名的辩证法大师和历史学家。然而,他对非洲历史的无知和由此而生的偏见却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在《历史哲学》中,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对非洲“几乎毫无所知”,另一方面却随意地使用关于黑人文化的零散资料,突出其落后面,并得出结论:非洲是一个仍处于“幼年时代的地方,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见自觉的历史的光明”,“自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发展,什么文化”。在对世界各种文明的描述中,非洲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②。

随着各种非洲文明见证(如麦罗埃废墟、大津巴布韦遗址、诺克文化以及热带非洲诸古国)被早期白人殖民者或后来的殖民主义者“发现”,对非洲历史的解释由“空白论”转为欧洲人类学家的“含米特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洲文明是外来文明,为含米特/闪米特人创造,而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属于高加索人种。据学者考查,含米特人的概念源自《圣经》,在18世纪以前等同于尼格罗人。拿破仑征服埃及后,殖民主义的需要使西方人逐渐将含米特人划归高加索人种。^③然而,鼓吹含米特理论的学者们从未在含米特人的特征上达成共识,他们或强调游牧为其专门职业,或突出其语言和宗教特征,有时则将肤色、身高、头盖骨或头发质地等体质特点加在一起来形容含米特人/闪米特人。总之,这些解释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非洲的所有文明成就是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带来的。

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为殖民主义统治提供了合法依据。

① 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The Listener*, 70, 1809 (1963), p. 871.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5—144页。

③ E. R. Sanders, “The Hami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 in Tim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0:4 (1969), pp. 521—532. 塞内加尔学者安塔·迪奥普的专著对“含米特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Cheikh Anta Diop, *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yth or Reality*, Lawrence Hill Books, 1974.



我族中心主义:一种范式

这种非洲历史“空白论”或非洲文明“外来说”对后来的世界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牛津大学的那位特雷沃尔—罗珀教授认为历史是一种“有目的的运动”,而非洲缺乏的正是这种运动。这无疑是在重复黑格尔的观点。史学大师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1966年仍坚持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非洲是文明渗透最晚的一个大陆,比其他地方晚了5000年。他认为,撒哈拉沙漠和沙漠平行的高原、沼泽与森林是使“黑暗的大陆”与世界文明隔绝的原因;虽然这两个障碍地带可以通过东面的印度洋和西面的大西洋来克服,但是从入海口进入非洲内陆又甚艰难。他由此得出结论:这就是西方人推迟了300年进入非洲内陆和非洲人未能在欧洲人到来以前获得文明的原因。^①这种将文化传播视为文明产生之唯一方式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也是对非洲古老文明的漠视,可以说是“空白论”和“外来说”的翻版。

这种以欧洲人的文明标准来衡量非洲乃至其他文明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客观地说,“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共有的文化现象,在交通闭塞、文化隔离的古代尚属自然。谁都认为自己的文化好。

罗马人曾自认为是最先进的民族,将所有其他民族都看做“野蛮”;希腊人颇为自己的出生地而洋洋自得。

中国人曾自以为地处中央之国,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来形容华夏中土四周的民族,用“金发碧眼”、“貌类猿猴”来形容初次见到的西洋人。

非洲人也不例外。温妮·曼德拉把她的祖母称为“我出世后认识的第一位种族主义者”,因为祖母告诉她那些有着蓝眼睛和苍白皮肤的白种人肯定有病。

还有一种对其他民族或文明的误会来自不了解。确实,由于交通隔绝和互不交往,不同文化或民族之间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

我与大家分享一件自己在非洲大陆亲身经历的事情。

1992年,我正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准备关于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的博士论文,我只身来到加纳首都阿克拉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资料。加纳是位于西非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阿克拉更是一个具有典型热带风光的海滨城市。

^① Arnold Toynbee, *Change and Habit,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4—95. 他在1972年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71.



当时,我住在师弟纳纳·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里。一天,他的妻弟吉米(Jimmy)来玩,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工作的教会参观。他在恩萨瓦姆(Nsawam)工作,这是一个曾经因种植可可而兴旺的小镇。我坐着他的车来到恩萨瓦姆。小镇已经衰落,有“绿色黄金”之称的可可种植业失去了昔日辉煌。吉米所在的教会里各种设备都很齐全,从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到厨房内的电器设施。教会还办了一个帮助残疾儿童的自助中心。

我被邀请在教会用晚餐。一起吃饭的有六七个人,除了两位早期就在加纳从事传教工作的美国人外,其余都是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了欢迎我,他们专门买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用餐前,一位年龄最大的非洲教士拿起酒瓶准备斟酒。他打开瓶塞后,用嘴对着酒瓶喝了一口。见到这种场景,我十分诧异,心想:这可不合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啊!哪有不让客人却自己先喝将起来的理儿?正当我在心中暗暗将自己民族的“礼貌”和恩萨瓦姆教士的“无礼”进行对比时,老人十分礼貌地对我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有毒药。你已经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说完,他首先给我斟酒。当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当地的这种习俗如何形成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在历史上因喝酒吃过亏,这是一种从痛苦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并在后来待人接物的过程中用礼仪的形式固定下来。也许是先人在奴隶贸易期间因喝过生人的酒成了被缚的奴隶?或者是在殖民统治前期的绥靖过程中因贪杯而误中他人奸计?

回到上面我的经历,如果没有那位老教士的解释,我对这一场景的解读可能会完全不同。假如我将建立在自己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错误理解带到加拿大,再带回中国,在朋友们中间传播,留下的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对好客的加纳人的误会与遗憾。

当然,文化隔绝的状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改变。随着人类的进步,如果文化偏见仍然被用来作为种族歧视或殖民统治的合法依据,文化偏见便成了政治的婢女。当这种偏见到了痴迷的地步,那是既可笑又可怕的。欧洲人对中国人印象的转变很能说明问题:从先进的民族转变为落后的民族,从模仿中国之风、以收藏中国物器为荣到讥讽和嘲笑中国的风俗习惯。现在,这一切似乎又在发生变化。

人类起源的探讨:非洲的优势

非洲有历史吗?回答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非洲文明有着自身特点。先



让我们来看看古代非洲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的表现。

研究人类起源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人类起源探索的证据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早期进化各阶段的人类化石;其二,通过有形的产物、工具和艺术品种体现的人类行为;其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分子遗传学的解释。人们多年对人类起源的探索已经提出了三种假说:“多地区起源说”、“走出非洲说”和“线粒体夏娃假说”。

“多地区起源说”是一种多元说,即认为现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个旧大陆的事件,现代人出现于任何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智人在各大洲逐渐进化成现代人,并伴有基因交流。

“走出非洲说”认为现代智人在近期产生于非洲,很快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地已有智人前的人群杂交,但非洲现代智人取代了已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这些人群的遗传根源浅,均来自晚近才在非洲进化出来的单一人群。

“线粒体夏娃假说”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的现代人起源假说,它基本上支持“走出非洲说”,但否认杂交的可能。根据这种假说,当现代人群迁移出非洲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时,他们完全取代了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以前的群体。移民与当地人群之间杂交的可能性极小。

尽管在学术界存在着人类起源“一元说”和“多元说”的不同观点,但有两点已为目前的研究所证实。其一,在非洲发现的反映人类早期演变的头盖骨化石系列最为齐全;其二,二十多年的分子遗传基因研究为人类起源于非洲提供了多种新证据。

古代人类文明:非洲的明证

岩画是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非洲是保存了最多人类岩画的大陆,共有超过1000万幅岩画分散在广袤的大陆。它也是岩画历史最早的大陆之一,在纳米比亚发现的一些有关动物题材的岩画已有27000年的历史。这些岩画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风格,往往与当地的原始宗教有某种联系,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被现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最为原始的南部非洲的桑人(San,因生活在丛林而被早期欧洲殖民者蔑称为“布须曼人”,Bushmen)却创造了极富艺术魅力和现实主义特点的“布须曼岩画”(Bushmen rock-paintings),包括岩刻和岩画两种。各种岩刻造型生动,散布于沿卡拉哈里沙漠东部以南的荒野岩石或干涸河床的铁石上,内容多为动物造型,有长颈鹿、大象、斑马、角马、羚羊、野猪、狒狒、



驼鸟、飞禽等。岩画中则除了动物之外,还有各种人像,或从事狩猎,或从事生产,散布于奥兰治自由邦、德兰士瓦省、开普省以及邻近的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国。这些岩刻和岩画的创造年代始于公元前 6000 年。金属冶炼技术是古代非洲文明的亮点之一。从约公元前 500 年开始出现的炼铁术在非洲如此普遍,以致考古学家启用了“非洲铁器时代”这一专有名词;古代的黄金冶炼使非洲成为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地方;青铜的冶炼更使非洲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非洲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困难之一是文字史料的局限性较大。非洲除了古埃及文字、科普特文字和阿拉伯文字外,还有古代苏丹的麦罗埃文字(Meroe)、利比亚的提芬纳文字(Tifinag)、埃塞俄比亚的盖兹文字(Ge'ez)和阿姆哈拉文字(Amhara)、东非的斯瓦希里文字(Kiswahili),以及西非包括豪萨文(Hausa)、富尔贝文(Fulbe)和卡努里文(Karuri)的阿贾米(Ajami)文字体系。然而,这些文字或已经失传,或使用范围小。破译麦罗埃古文字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以诺克文化为代表的非洲古代赤陶雕像和头像雕刻曾在欧洲引起骚动,人们为它那巨大的表现力所震撼,宽大而突出的前额、短小而扁平的鼻子、厚实而性感的嘴唇以及充满生命张力的想象、极为夸张的手法、看似变态的造型……欧洲现代艺术在诸多方面受到非洲艺术的熏陶和影响。非洲雕刻的独特风格给毕加索(P. Picasso)极大的震撼,使他有幸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立体画,马蒂斯(H. Matisse)明显吸取了丰富的非洲艺术营养而创立了野兽派,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在受到诺克雕刻的强烈影响后自创一派而被称为抽象雕刻的“鼻祖”,英国著名雕刻家亨利·穆尔(Henry Moore)的作品渗透了非洲石雕古朴、形象和夸张的风格。

难怪,西方艺术评论家也认为“西非给世界艺术宝库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非洲雕刻的传统艺术是无与伦比的。”^①此外,非洲的音乐、舞蹈和文学为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增添了无数奇葩。

大学的建立是人类文化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我们是否注意到,世界最早的大学中,非洲占了三所。其中两所位于北部,一所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即创立于公元 859 年位于今摩洛哥非斯的卡拉韦因经学院(University of Al-Karao-uine)、创立于公元 975 年位于今埃及开罗的阿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和创立于 1327 年位于今马里廷巴克图的桑科雷大学(University of Sankore)。

人们对欧洲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都很熟悉,但对非洲著名旅

^① 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92, p. 154.



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却知之甚少。历史学家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布鲁戴尔(Fernand Braudel)这些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正是非洲早在14世纪就为世界奉献了伊本·赫尔敦(Ibn Khaldun, 1332—1406)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突尼斯出生的伊本·赫尔敦的《历史绪论》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他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人文社会科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首先,赫尔敦是最早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研究历史的社会经济史学家。他率先提出了文明衰落与人口锐减的关系,关于游牧民在军事上比定居者占优势的观点构成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其次,他指出历史不能只记载表面的东西,“如果只是记述从前某一君主的女子们的名字,或这位君主的戒指上铭刻的字样,那有什么好处呢?”在研究对象上,他将社会分成两个主要的集团——农业—畜牧地区和城市地区,与之相对应的是平等主义团结精神与国王的独裁统治。最后,他先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不同民族在习惯和制度上的差异取决于每个民族提供其生存资料的方式。”

对这样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确实不能视而不见。

古代王国:非洲的贡献

古代非洲有国家吗?回答也是肯定的。尽管国际学术界已经习惯于用西方的定义和话语权来形容国家,但具有武装力量、法律和固定边界的政治体从很早就存在于非洲大陆。

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非洲古国的痕迹。

对古埃及文明,世界学术界已有定论。然而,对非洲其他地域的文明,人们则是持另一种态度,或不甚明了,或极力否认。

公元前9世纪的库施王国将努比亚地区的辉煌再次写进了世界史,并成为历史学家着迷的时代。这个王国兴起于尼罗河中游的栋古拉地区,位于圣山巴卡尔山麓的纳帕塔成为库施王国的第一个首都。库施王国的势力不断扩张,刚开始时主要集中在第四瀑布以南地区,包括艾尔—库鲁、努里、贾巴尔—巴卡尔、萨纳姆等地。然而,在公元前8—7世纪,它征服了埃及,并成为古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统治者,以“努比亚的统治者”的名称流传至今。

努比亚国王何时开始统治古埃及至今仍是谜。一位名叫卡希塔(Kash-ta)的努比亚国王自称为“埃及法老”。有关他的方尖碑记载着他在上埃及的战绩。他确实控制了底比斯吗?无人知晓。在今天的阿斯旺(当时叫埃利凡泰恩, Elephantine)地区发现了他的石碑,上面带有埃及人专用于国王名和神名的



装饰图案。根据苏丹历史记载,公元前750—公元前666年间,来自库施的苏丹人征服了埃及。

库施人对埃及的征战发生在佩耶时代。佩耶在公元前747—公元前735年登上王位,并于公元前728—公元前716年发动了对埃及的征服之战。这位名声显赫的库施人国王以他的骁勇善战征服了近千年来一直觊觎并侵略努比亚的埃及,正式成为法老并建立了库施帝国。随后建立的努比亚人统治的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即历史学家称之为“埃塞俄比亚王朝”的时代。“胜利之碑”是古代埃及留下的内容最为详尽的碑文之一:“听朕之所为,甚于祖先。朕乃国王,神圣之光,阿蒙神之表象……”^①159行象形文字叙述了佩耶的施政、征战和生活。

另一块佩耶石碑的铭文记载:“纳帕塔之阿蒙,使朕君临万民。朕曰,‘汝其为王’,受朕此命者即为王;朕曰,‘汝勿为王’,受朕此命者即勿为王。底比斯之阿蒙使朕君临埃及。朕曰,‘衣王者之裳’,受朕此命者即衣王者之裳;朕曰,‘勿衣王者之裳’,受朕此命者即勿衣王者之裳……诸神授人君位,万民授人君位,而朕乃阿蒙所授者也。”^①

碑文向我们揭示了作为埃及法老佩耶所掌握王权的神圣性。它明文规定了库施帝国的君权神授体制,也明言阿蒙为至高无上的神。

将库施击败的是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阿克苏姆文明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从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的距离可以推断,这两个地区的交往应早已开始,这一点也被考古发现证明。以阿克苏姆为代表的埃塞俄比亚文明虽然在早期受到南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但它的本土特征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出生在亚历山大城的古代地理学家克劳迪乌斯·托勒密乌斯(Claudius Ptolemaeus)的记载,阿克苏姆城的修建和阿克苏姆王朝的出现可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这一点得到了约公元1世纪出版的《红海回航记》的应证。

这部早期地理学著作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居住在埃及的希腊水手,他在著作中记载:公元1世纪,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者是佐斯卡勒斯(Zoscales),“他为人吝啬,总想多捞一些。但除此之外,他是正派的”。这位国王占据着红海的两个著名港口——阿杜利斯(在今厄立特里亚)和阿瓦里兹(阿萨布,在今厄立特里亚)。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佐斯卡勒斯国王对希腊文学十分熟悉。埃塞俄比亚古代农业的发展程度是非洲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著名的英国非洲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认为:“在山坡上修建梯田和灌溉工程的文化

^① 1862年从巴卡尔圣山发现的这块石碑目前存放在开罗博物馆,有关石碑铭文的内容,参见James Henry Breasted, 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4,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pp. 406—444。



是非洲东部和东南部早期文明一个不可分割的重大方面。”1893年访问过提格雷的欧洲人是这样描述的^①：

四野的群山布满了梯田耕地……在希腊或小亚细亚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见过像这个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谷地那样规模巨大的山间梯田。过去定有几十万英亩被精耕细作着,几乎一直耕到山顶;而现在,除了一条条整齐的土畦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阿克苏姆王国的居民种植了大面积的谷物。多个国王发行的钱币上的谷穗可以表明农业生产是这个古老王国重要的经济基础。根据铭文记载,阿克苏姆王国的一名地方行政官曾施予管辖区的百姓520坛啤酒和20600个面包。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农业的发达。畜牧业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皮货和皮制品是外贸的主要商品之一。手工业也相当发达。然而,从占据着连接非、亚两个大陆之间的重要海上通道的两个重要港口这一点来看,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是阿克苏姆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这一点早期作者有所记录。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弗斯(Ptolemy II Philadelphus)修建了阿杜利斯港,当时称为费拉德尔弗斯城,很有可能是为了炫耀他自己的功绩。他的继任者托勒密三世尤尔杰蒂斯(Ptolemy III Euergetes)又对这一港口进行了扩建。

普林尼在公元75年指出,阿杜利斯港是红海最重要的停泊港之一,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商业中心。《红海回航记》提到了阿杜利斯港,说它是“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港口”,“在港口的前面横卧着所谓的高山岛,它离港湾的尽头处约二百希腊丈(一希腊丈约189公尺),两侧距大陆的海岸线都很近。驶向这个港口的船只现在都在这里抛锚,因为陆地上有人袭击”。很明显,这个港口的业务十分繁忙,以至引起了沿岸地区不法之徒的觊觎。

《红海回航记》还为我们留下了佐斯卡勒斯国王统治下的阿克苏姆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名单:“他们把埃及制造的粗糙而无皱褶的棉布制的披风运到那些地方卖给野蛮人,还有在迪奥斯波利斯制造的染色战袍仿制品,两面都经过修饰的毯子,用透明玻璃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器皿,其他用釉料泥模压成的亚宝石容器,以及黄铜、紫铜和铁。除其他东西外,还运来小斧、板斧、刀、大圆铜碗,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使用的一些第纳尔(指古罗马银币)、少量劳迪塞、意大利酒和橄榄油。他们运来按本地式样制造的供国王使用的金银器皿。他们运来的外衣如战袍和带兜帽的外套等价格并不是很贵。他们从[印度中部]阿里阿卡内

^① [英]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葛屠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20页。



地运来印度铁和钢以及棉织品(特别是布面较宽、比较粗糙的名为莫洛希纳和西格马托黑纳的布料)、腰带、斗蓬、少许莫洛希纳亚麻的衣服和类似清漆色的布料。”实际上,可列入这一外贸商品清单的还有很多其他外国货,如锡、束腰外衣、毛制披风、阿西诺伊毛料斗蓬、各种埃及产品、麦罗埃的棉制品、铁器和手工艺品、阿拉伯半岛南部穆扎出产的铁器和玻璃制品、罗马一拜占廷帝国的酒器和油壶、索马里北部的薰香和香料以及印度的小麦、大米、芝麻油和甘蔗等。

在《红海回航记》中,阿杜利斯被描述为距内地主要象牙市场科洛埃镇三天路程的一个大村庄。“从这里到人们称为阿克苏姆的城市还有五天路程。人们从尼罗河以西的地方把全部象牙运到科洛埃,然后穿越昔埃努姆地区,最后才运到阿杜利斯。”阿杜利斯是阿克苏姆的出海口岸,主要是出口象牙、犀牛角、龟甲和黑曜岩等。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克苏姆是当时世界贸易中的第一流贸易大国。首先,它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控制着两个天然良港和一条十分重要的贸易航道。这使阿克苏姆王室有可能掌握世界贸易流通过程中的商品、信息、管理和通道。其次,从上述极其丰富的贸易商品来看,阿克苏姆与当时颇为繁荣的欧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它既是各种舶来品的消费者,也扮演着从事转手贸易的掮客角色。例如,它从努比亚沙漠地带的布勒米人那里得到绿宝石后运到印度北部出售。同样,从阿杜利斯输出的一些商品实际上是从非洲内陆地区进口的。关税制度已经建立。到阿克苏姆王国从事贸易活动的有希腊人、叙利亚人、印度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附近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和努比亚人,他们在阿杜利斯、阿克苏姆、马塔拉等市镇以及阿拉图、托孔达、埃奇马雷、德贡姆、哈盖罗—德拉圭、亨扎特等其他居民区居住,并带来了一些颇具异国情调的衡器和生活用品。

由于贸易的通畅和交换的需要,阿克苏姆从公元3世纪起成为热带非洲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发行金属货币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措施。它不仅表明了国家物质的丰富,也表明了政治的稳定,还向邻国宣示阿克苏姆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非洲文明:欧洲人的钦佩与羡慕

埃塞俄比亚早在公元4世纪以前就建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石碑。墨索里尼曾经从阿克苏姆将一块这样的石碑掠夺到意大利。它重50吨,高24米,是在阿克苏姆王国时期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目前类似石碑在埃塞俄比亚有130多块,有的具有同样的雕刻图案。



此外,还有西部非洲的加纳、马里、桑海王国、东非海岸的城邦国家、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和刚果王国以及中西部非洲的森林王国等。当一些欧洲人初次接触到古代非洲国家或一些古老非洲遗迹时,他们都留下了惊叹。

荷兰著作家达珀(O. Dapper)在1668年出版的有关贝宁的记事中谈到17世纪时的贝宁王国居民时提到了该国的法律和警察^①:

人民有良好的法律和组织严密的警察;他们和前来做生意的荷兰人以及其他的外国人关系良好,对这些人表示无限友谊。

英国人芒戈·帕克(Mungo Park)在18世纪末是这样记录他所见到的尼日尔河上的塞古(Segu)那种“文明壮丽的景象”^②:

这个广大城市的情景,河上无数小船,拥挤的人群,附近农村的耕作情况,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文明壮丽的景象。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在非洲的腹地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巴尔特(Heinrich Barth)在19世纪中叶谈到卡诺的纺织工业时认为卡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③: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工业并不像欧洲那样在一些使人们的生活堕落到最下贱的地步的巨大的公司中进行的,而是给许多家庭以职业和支持,并不牺牲他们的家庭生活习惯的话,我们必然会认为卡诺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只要它那些经常是很懒散的总督,能够保护它的居民,不受邻居的贪心危害,它是最幸福的。

于1895—1896年在尼日尔河流域考察的法国殖民考察队队长乌尔斯特(Hourst)在参观桑海帝国首府加奥遗址后颇有感慨^④:

在当时,桑海帝国不仅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帕麦尔(H. R. Palmer)在评论12世纪博尔努王国时认为,一些当地酋长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国王^⑤:

① [英]J. D. 费奇:《西非简史》(于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3页。

② Basil Davidson, *Africa History of a Continent*, London: Spring Books, 1972, p. 245.

③ [英]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第189—190页。

④ [法]埃德蒙·塞雷·德里维埃:《尼日尔史》(上海师范大学《尼日尔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5页。

⑤ 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p. 213.



在这些世纪中,当基督教的西方还处于无知、尚未开化和野蛮状态的时候,撒拉逊文化已把文明的火炬传给了后世。从加涅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生的博尔努国家从埃及和北非得到了启示。虽然它对于周围的非洲各族人民无情而且残暴,但是它的一些早期的酋长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看来比同时期的一些欧洲王国还要高一筹。

非洲学者也会对非洲大陆的文明提出自己的看法。1949年诺贝尔奖提名者、才华横溢的加纳医生、作家和诗人阿尔玛托(Raphael Armattoe, 1913—1953)曾认为:“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西非比欧洲具有更稳固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达到更高程度的内聚力,对科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也成熟得多。”^①

位于今津巴布韦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已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古迹。它那椭圆型大围城的无灰浆、无缝隙的建筑技术及设计风格至今仍使世人迷惑不已,无论是“迁移说”也好,“贸易说”和“宗教说”也好,都难以给予令人信服的理由。难怪早期欧洲的探险者只能用天外来客的杰作来解释它的存在。古代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曾长期称雄于西部非洲,在世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325年,马里帝国国王曼萨·穆萨一世(Mansa Musa I)曾到开罗朝觐。他所带的随从达数万名之多。由于他所携带的大量黄金和慷慨的施舍,开罗市场的金价据说因此下跌了12%。加涅姆—博尔努是位于乍得湖地区的古代商业帝国,其领土在不同时期涵盖中非和西非部分地区。建立这一帝国的塞福瓦王朝(Sefuwa dynasty)始于750年,终于1846年,是世界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非洲的国家有大有小,成型有先有后,但非洲的一些国家很早就进入了国家形成的阶段,这一点不容置疑。

最近由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皇家非洲学会共同制作的一个有关非洲文明的动态地图也说明了欧洲人对非洲早期文明的认可。

近代世界进程中的非洲:厄运与成就

近代以来,中国与非洲可谓同命运。资本主义以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为自己开辟道路。非洲人与中国人成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牺牲品。从16世纪到19世纪,200多万的欧洲人移民新大陆;1500万—3000万的非洲人被强迫运至美洲从事种植园奴隶劳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近6000万中国劳动力以契约劳工或自由劳动力的方式迁移世界各地。这种全球性的劳动力迁移

^① 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p. 163.



为世界发展带来了大量财富。作为早期美洲殖民地的主要劳动力,非洲黑人移民为欧洲的原始积累打下基础,成为工业革命的直接贡献者。

对长达约八十年的殖民统治进行全盘肯定或一味否定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才能体会其含义。最突出的一点是非洲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新的地理版图培育了新的非洲民族主义。本土的政治管理体制受到限制,非洲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失去独立而受到最彻底的遏制。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非洲提供了便利,一些初级产品得到开发。然而,原有的工业基础遭到破坏,不合理的经济布局和依附性的产品开发给非洲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困难。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带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更为持久。

独立以来的发展曾给非洲和世界带来希望。由于非洲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在整体上不尽如人意。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非洲所取得的成就。

地区一体化 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欧洲经过近三百五十年的努力,其一体化进程虽在政治上蹒跚不前,但欧盟的成立总算有所成果。同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表明美、加、墨建国两百多年后达成了某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再来看非洲大陆。由于特有的历史,一体化在非洲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互动。独立五十多年来,非洲一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非统组织的成立是非洲一体化的体现,也在制止边界纠纷和加强地区联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第37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于2001年一致通过旨在促进非洲复兴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这是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非洲国家希望借助这一战略发展框架,共同应对挑战。2002年7月非洲联盟宣告成立,从而在非洲自立自强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成立之日起,非洲联盟就期待由非洲人主导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全面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创造条件。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从布隆迪到刚果(金),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从苏丹南北内战的结束到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任务,非盟在平息战乱、阻止冲突、维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主导非洲内部事务的过程中,它依靠区域组织和区域大国,其领导权威已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的建立、泛非议会的成立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确立从制度上提供了非洲联盟作为一个大陆一体化的机制保障。更难得的是,非洲大陆在面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在世界舞台上以统一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是其他大陆所难以比拟的。

人权问题 非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一直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人权”是



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批评非洲国家的根据,也是它们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重要条件。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西方国家对其人权问题的指责。虽然非洲仍然存在着稳定与公正等问题,但非洲独立以来人权方面的成就不容置疑。我们来看看人权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妇女权问题。大家知道,欧洲的妇女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赢得了选举权,整个欧洲到1950年才普遍实行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其中德国1918年,英国1928年,法国1945年,意大利1946年,比利时1948年)。^①美国妇女在独立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争得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而非洲国家的妇女在独立后几十年内整体上享受到的权利远远超过欧洲和美国妇女。除了享有投票权外,她们中有人当上了联合国大会主席,如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于1969—1970年当上了联合国大会主席;有人成为政府部长,如伊丽沙白·巴加亚公主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任乌干达外交部长;有人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如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于200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人成为总统,如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2005年的大选中胜出,成为非洲第一位女总统。这些权利与成就都是欧美的妇女无法比拟的。多哥总统曾表示:西方国家在殖民化时期从不讲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时也不讲人权,现在他们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②

边界稳定 边界战争成为近代主权国家之间为确立、变更或维护本国国界而进行的战争,与国家版图的变化密切相关。比较一下欧洲与非洲在民族国家建立后的版图变更以及为改变边界而进行的战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欧洲现代独立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为标志,至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为更改国家版图而进行的惨烈战争。非洲国家版图和边界的确立是殖民统治的产物。非洲边界问题专家、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研究非洲边界问题的学者均认可两种观点:非洲从没有过严格的边界概念,因为非洲地广人稀,游牧民族迁移和地形极为复杂;非洲的边界是人为造成的,是殖民主义列强强加的。根据原苏联专家阿·葛罗米柯的研究,非洲边界44%是按经纬线划的,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的,只有26%的边界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③这种由殖民主义者划定的边界使非

① [英]C. L. 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③ [埃及]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仓友衡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